

论马克思哲学思维方式转变的一个关键环节

——基于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析*

侯继迎,倪志安

[关键词]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本主义思维方式;对象性活动;实践思维方式

[摘要] 马克思新唯物主义所实现的哲学变革,实质上是以实践思维方式否定了一切旧哲学的思维方式。在马克思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变过程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居于承上启下的特殊地位。在《手稿》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思维方式,但“笔记本III”中“对象性活动”理论的提出,却体现着马克思对黑格尔思辨思维方式的——“自我活动(劳动)”辩证法原则的扬弃,它成为马克思哲学思维方式转变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对实践思维方式的最终确立具有重要意义。正由于《手稿》中这种冲突的存在,才使得几个月后马克思所发动的哲学革命、哲学思维方式转变的内在逻辑可以得到合理的理解和阐释。

[作者简介] 侯继迎,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山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倪志安,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重庆 400715)。

所谓“哲学变革”,从显层次(世界观)看是一种哲学观点、哲学理论的变革,从隐层次(方法论)看却是一种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因为,一定哲学的观点、理论及其思想体系都是由一定哲学的思维方式^①所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把握了一定哲学隐层次的思维方式,才能理解这种哲学的最高本质与精神实质;只有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的根本

转变,也才能促使哲学的重大变革与历史创新。相应地,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之所以能够实现对传统哲学的划时代变革,就在于他所独创的实践思维方式^②是根本异于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所以,实践思维方式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本质特征,实践思维方式的确立是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的实质。

马克思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变,经历了“黑格尔的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100年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成果及其方法论研究”(项目号:15BZX001)和西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培育“‘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100年重要成果及其方法论研究”(项目号:14XDSKZD007)的阶段性成果。

① 一定哲学思维方式如何思考相关哲学问题内在的“道”或“理”,即是一定哲学的“思维逻辑”,实际上,是哲学的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的转变决定着一定的“哲学变革”,本文主要研讨的是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变问题。

② 对马克思“实践思维方式”的具体论证,参见倪志安:《论马克思新哲学的实践思维方式》,《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倪志安等:《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研究》第二章“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式”,第46-88页,人民出版社,2007年。

思辨思维方式→费尔巴哈的人本思维方式→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实践思维方式’”的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在我们看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是马克思的哲学思维完成最后一步转变、从而最终确立实践思维方式的根本标志。当然,“实践思维方式”不是凭空创生的,它的确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在马克思的哲学思维从“费尔巴哈的人本思维方式→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实践思维方式’”的转变中,处于承上启下的中间环节,这种特殊地位使之成为我们理解马克思哲学思维转变的关键一环。

一、关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合理定位

在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史中,对《手稿》到底应该如何定位,理论界向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主要存在着“不成熟论”和“巅峰论”的分歧与论争。

《手稿》是1844年马克思流亡巴黎时写下的文本,所以又称“巴黎手稿”。由于马克思从未发表,所以很长时间人们一直不知道它的存在。直到20世纪20年代,苏联马列主义研究院梁赞诺夫院长在整理马克思的早期手稿时,才发现了这一未完成的重要文本,并误以为是《神圣家族》一书的准备性材料。1927年,梁赞诺夫在他主持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3卷的附录中以《〈神圣家族〉的预备著作》为标题,发表了《第三手稿》(即笔记本III)的大部分内容。1929年,在巴黎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评论》杂志上,编者又发表了另一些片断(如《关于共产主义和私有制的札记》、《关于需要、生产和分配的札记》等)。1932年,《手稿》的德语原文全部内容在苏联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部分第三卷中公开面世,并第一次被冠之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名称。应该说,《手稿》的这三次出版都没能引起当时作为“苏联马哲模式”的——即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充分重视和注意。因为在他们看来,《手稿》时期的马克思是费尔巴哈哲学的忠实追随者,其理论建构遵循的完全是抽象的人本主义

路线;后来,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创立他的伟大理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正是由于放弃了《手稿》的基本思想。基于此,他们将《手稿》定位为“马克思不成熟的早期著作”。与当时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冷淡态度相反,《手稿》引起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极大学术兴趣,他们将这一文本的问世称之为马克思的“第二次降世”。随之,一场声势浩大的《手稿》研究热潮于20世纪40—60年代在西方如火如荼地展开。这些研究者通过对《手稿》的深入挖掘与解读,发现马克思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人本主义者。“人”是他当时全部理论的出发点,《手稿》中所表达的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正是其一生中最具有活力的思想。后来,“成年马克思”则表现为一种明显的思想衰退,走向了对“青年马克思”的背叛。基于此,在他们看来,《手稿》不仅不是马克思的“不成熟之作”,而且应该说是“巅峰之作”。由之,这些研究者从人本主义的立场出发,展开了对物本主义的“苏联马哲模式”的激烈批判,试图“回到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以恢复所谓马克思哲学的本来面目。

“中国学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①可以说几乎是重演了这一历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时,虽然有多种传播渠道,但由于十月革命的巨大影响,使得我们接受的主要是物本主义的——即“苏联马哲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虽早在1956年,何思敬、宗白华先生就出版了马克思《手稿》的第一个中译本,但就像该《手稿》之前在苏联出版后的情形一样,在此后的20多年里,这个《手稿》在中国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社会政治环境宽松了:一方面,人们开始了对“文化大革命”中种种反人道主义的行为进行反思;另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道主义、人性和异化等相关理论、思想也广泛传入。这两方面因素共同促使我们的学术界展开了对过去简单地将“人道主义斥之为资产阶级思想是否恰当的问题”、对以物本主义思维方式解读的“‘苏联马哲模式’是否具有合理性问题”的深入思考。恰逢此时,1979年,刘丕坤译本的《手稿》在我国出版了。几乎与此同时,我国学术界掀起了对马

^① 所谓“中国学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指以学术研究形态存在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成果中富有活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克思这个《手稿》的研究热潮,展开了一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论战。通过这场论战,人们开始对“苏联马哲模式”和以“苏联马哲模式”为蓝本的——我国“马哲”传统教科书提出质疑和挑战,以期通过这种对马克思早期文本的深入研究,发现和恢复马克思哲学中“人道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并据此来重新理解和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本主义解读中,有些学者认为,《手稿》是马克思早期的不成熟著作,其理论观点对我们的参考价值不大,《提纲》才是“真正的马克思”著作的起始,因为,在《手稿》和《提纲》之间,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存在着明显的断裂关系。与此不同,有些学者则认为,《手稿》中马克思的思想已经成熟,特别是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人的本质应是《手稿》中所说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这两种观点看似不同,实际上所犯的是一种同样的错误——即没有从哲学思维方式的根本不同去看待《手稿》和《提纲》的区别,从而也就未能对《手稿》作出一种合理的定位。

在我们看来,“不成熟论”与“巅峰论”实际上都是一种简单的“二分法”,由之,不仅会人为制造“两个马克思”的对立,而且还会造成对《手稿》的不合理定位。我们认为,马克思新哲学思想(包括其内在的哲学思维方式)的确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存在一个“孕育—萌芽—发展—成熟”的过程。在其中,《手稿》就处于“中间环节”的特殊地位,起着“承前启后”的特殊作用。总体来看,《手稿》时期,马克思赞扬肯定的是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哲学”,批判否定的是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哲学”。所以,从《手稿》中马克思的哲学思维方式看,占主导地位的是“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思维方式。但是,马克思对费尔巴哈从来不是盲目信从,对黑格尔也从来不是弃之不顾。体现在《手稿》中:马克思不仅在一些具体哲学思想上超越了费尔巴哈,特别是在哲学思维方式方面也表现出了他的过人之处——当他撰写“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一节时,敏锐地洞察到黑格尔哲学在思辨形式下所包含的劳动辩证法的“伟大之处”(劳动与人的自我生成、独特的

存在论视域等),从而创造性地提出了“对象性活动”理论的思维方式,更是凸显了他对费尔巴哈的超越。阿尔都塞就曾指出,《手稿》处在马克思“同他‘从前的哲学信仰’决裂的前夕”,但他“却破天荒地向黑格尔求助,从而产生了一种为清算他的‘疯狂的’信仰所不可缺少的、奇迹般的理论‘逆反应’……马克思通过《1844年手稿》在最后关头突然完全回到黑格尔那儿去”。^{[1](P17)}阿尔都塞的论断我们不能苟同,但他确实注意到了黑格尔哲学在《手稿》时期所起的特殊作用。我们认为,马克思在《手稿》中虽没有批判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维方式”,但通过对黑格尔“思辨思维方式”的扬弃所提出的“对象性活动”理论,其哲学思维方式明显地包含着随后《提纲》“实践思维方式”的萌芽。

二、《手稿》总体上遵循的是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思维方式

在《手稿》的“序言”中,马克思说:“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从费尔巴哈起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2](P4)}那么,给马克思的“批判”打下“真正的基础”的到底是费尔巴哈的什么发现?在我们看来,就是18世纪唯物主义所不具有的、费尔巴哈独创的人本主义思维方式及其人本学。《手稿》时期,马克思“对人的社会和历史的发展的论述还是从带有费尔巴哈色彩的人道主义观点出发的。”^{[3](P132)}“将作为类的人(人类、人性)放在根本乃至原理的位置”^{[4](P147)}是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共同之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马克思为什么会在1844年8月11日写给费尔巴哈的信中,把自己对他的崇拜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①。

先来看费尔巴哈创立的人本主义思维方式。在费氏的人本唯物主义哲学中,“类本质”、“异化”是核心范畴。所谓“类本质”,即是指所有人共同具有的自然属性,这种自然属性把一切人类个体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并使人成为人而区别于其他物种。按这一规定,“类本质”就存在于感性的人之中。正如

①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大约写于1844年5月底6月初—8月。

费尔巴哈所言,“作为人的人底绝对本质”“就是理性、意志、心”,它是“在人里面形成类、即形成本来的人性的东西。”^{[5](P27-28)}以这种“本来的人性的东西”来衡量现实,就会发现矛盾与冲突的存在——比如,人的类本质本应属于人自己,人却把它给了基督教的上帝,自己反而成了上帝的奴仆,这就是“异化”,即主体分裂出与自己对立的异己力量来统治自己。上帝既然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那对宗教的批判就不可避免。批判的目的是扬弃异化,使人认识到“上帝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从而把人的类本质归还于人,实现向人自身的复归,这样一来,人也就成为了真正的人,这就是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的宗教异化观。由此可见,他的人本主义思维方式就是:先主观设定理想化的人的类本质,这就是标准,然后再以此标准去衡量现实,凡“跟类之本质相一致的,就是真的,跟类之本质相矛盾的,就是假的”。^{[5](P194)}“假的”就是“异化”,即与人处于对象性关系的事物和人的类本质相冲突,这时就要通过批判消除异化,以使人的类本质复归于人自身。只有这样,人才成为真正的人、现实的人。

再来看《手稿》时期马克思的哲学思维方式。在对资本主义“异化劳动”展开批判时,马克思也是先对人的“类本质”做了先验设定。他认为,人“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这里的“类本质”、“类生活”就是《手稿》中马克思所使用的“异化劳动”概念的前提。正如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所说:“既然人的异化产生历史和人,那么这一异化就意味着有一种先于人而存在的确定本质。”那么,这种“先于人而存在的确定本质”是什么呢?马克思在《手稿》中是这样说的:“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2](P57)}也就是说,“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正是马克思为了论证他的“异化劳动”理论所设定的那种先验的、理想化的人的类本质。拙文《劳动的双重意蕴——谋生目的与自由维度》^①曾提出,任何现实的劳动,都具有谋生目的和自由维度这双重意蕴,是二者的内在统一。

马克思对人的类本质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的设定,显然割裂了劳动所本有的双重意蕴之间的统一关系,将自由维度这一意蕴绝对化为一种具体的劳动本身。一旦被绝对化,劳动的谋生性就被完全排除掉了,这种劳动也就只能是不受任何社会关系制约、不受任何主体利益限制的一种理论虚构。

在“类本质”的价值悬设下,人最初(当然,这里的“最初”也只能是“逻辑上”的而非“历史上”的)占有自己的本质,其劳动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接着,马克思就以这种抽象的人的类本质作为标准和尺度来衡量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的劳动与现实中的“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2](P55)}这样一来,“现实中的劳动”就是使人失去“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这个类本质的动物式的活动——异化劳动。“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对人来说不过是满足一种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一种手段。”^{[2](P57)}这种劳动无法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无法体现出人的价值和尊严。“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2](P58)}人的类本质就异化为与人相对立的异己存在了。于是,“现实中的人”也就成了一种脱离自己类本质的动物式的人——异化的人。接下来,马克思作了进一步的推论:“现在要问,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这种异化又怎么以人的发展的本质为根据?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就已经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许多东西。因为人们谈到私有财产时,认为他们谈的是人之外的东西。而人们谈到劳动时,则认为是直接谈到人本身。问题的这种新的提法本身就已包含问题的解决。”^{[2](P63)}由此可以看出:正是异化劳动产生了私有财产,至于异化劳动的根源,则在人自身之中,是人的类本质与人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所导致的。

由于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类本质与人的现实之

^① 关于这一问题的具体论述,参见侯继迎:《劳动的双重意蕴——谋生目的与自由维度》,《东岳论丛》,2012年第10期。

间的矛盾”具有根本性,所以他在《手稿》中就进一步把这一矛盾看成是整个社会历史的基本矛盾和推动历史前进的内在动力。在它的推动下,社会历史发展就表现为“人的存在与人的类本质统一→人的存在与人的类本质背离→人的存在向人的类本质复归”这样的否定之否定过程。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处于否定阶段,也就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阶段,要实现人的类本质的复归,就必须推翻使人的类本质产生异化的资本主义。所以,马克思赞扬“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2](P81)}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手稿》中,在个别观念的问题上马克思和费尔巴哈不尽相同^①,但“‘从抽象的人的本质’去理解相关哲学问题”的人本主义思维方式则是他们共同遵循的。

三、《手稿》中“对象性活动”理论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哲学思维方式转变的一个关键环节

马克思在《手稿》中虽然总体上遵循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思维方式,但这并不是说他就是一个彻底的“费尔巴哈派”。在哲学思维方式方面,马克思实际上已具有对费尔巴哈的超越,这特别突出地体现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一节中,从而使《手稿》成为由“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思维方式→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实践思维方式’”转变的一个关键环节。正如科尔纽指出的:“不能容许把他(马克思——引者注)当时(《手稿》时期——引者注)的观点加以绝对化,并在此基础上虚构出一个‘人道主义的’马克思,用来和‘晚期的’马克思相对立”。这是因为,他在《手稿》中已“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新世界观的基本特征”。^{[3](P133)}对于科尔纽的这个结论,我们当然不能同意,但必须承认的是,随后《提纲》所表达的新世界观的特征(如“实践思维方式”)确实在《手稿》中就以“对象性活动”理论的思维方式

这种萌芽形式呈现出来了。

如前所述,在《手稿》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思维方式,但在“笔记本 III”讨论[私有财产和劳动]、[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私有财产和需要]等话题时,为什么又将[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穿插其中?这是因为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时,发现其中“潜在地包含着批判的一切要素,而且这些要素往往已经以远远超过黑格尔观点的方式准备好和加过工了”。^{[2](P100)}因而,马克思意识到要实现自己的哲学创造必须吸取黑格尔哲学的积极因素,于是产生了向他进一步学习的想法。由之,马克思创造性地提出了“对象性活动”理论,这一理论是费尔巴哈“感性对象性”原则和黑格尔“自我活动”的辩证法原则在马克思那里进一步融合创新的产物,但相比较而言,后一原则在这一过程中无疑起到了更为关键的作用。

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性”原则。黑格尔是讲过“对象化”的,但他的思辨哲学把现实的人与自我意识相等同,真正的主体成了自我意识,自我意识的对象化和对象化的克服也就是异化和对异化的扬弃。因此,“重新占有在异化规定内作为异己的东西产生的人的对象性本质,不仅具有扬弃异化的意义,而且具有扬弃对象性的意义,就是说,因此,人被看成非对象性的、唯灵论的存在物。”^{[2](P102)}针对黑格尔的抽象思辨,费尔巴哈反其道而行之,他诉诸于感性直观,用“感性的对象性”反对“思辨的对象性”,以对象性的主体来对抗非对象性的“绝对主体”,从而使作为主体的人成为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没有了对象,人就成了无”;“主体必然与其发生本质关系的那个对象,不外是这个主体固有而又客观的本质”。^{[5](P29)}因此,主体存在的现实性就在于对象性。这是费尔巴哈以人本主义的方式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解读,它无疑体现了他的伟大与超群。但遗憾的是,人本主义的思维方式致使费尔巴哈在这里停下了前进的脚步,因为他对包括人在内的整个世界的把握,仅仅是通过“感性直观”(也

① 如费尔巴哈谈的主要是宗教领域中的异化,马克思谈的则是经济领域中的异化。

即“对象性直观”)来实现的。在这种思维方式的规约下,人不过是一种感性直观的存在物,客体就是“直接呈现出来的那个样子”,也即单纯的直观和感性的对象。这种看待“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关系问题的方式,使费尔巴哈无法实现从自然领域到社会历史领域的过渡,所以,包括现实的人在内的社会历史问题就成为费尔巴哈哲学的一个理论盲点。

黑格尔“自我活动”的辩证法原则。在黑格尔看来,意识的发展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表现为“否定性的辩证法”:所谓“否定”,就是意识的“对象化”、“外化”;相应地,“失去对象”、“外化的扬弃”则是“否定之否定”。这一辩证法的形式是抽象思辨的,但其中却蕴涵着一个伟大的发现——自我活动(劳动)对人的积极意义:作为主体的人不是现成的、先验的,其活动本身具有“自我意识”之特性,凭借这一特性,他能够把自己的力量外化(也就是对象化)到对象上去。如此,这种作为自我意识的人也就是“自我产生”的——劳动是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在对象化活动中,人不仅扬弃了自身欲望的直接性而复归于精神,同时抽象精神的普遍性也走出自身不断向前发展。只有经历了外化自身并扬弃这种外化而返回自身的人,才是现实的人。由此,黑格尔将劳动与人的本质联系起来,探讨了劳动同人的自我生成的内在关系,揭示了劳动的存在论意义。正是在这种理解中,黑格尔论证了人的存在的历史性,达到了历史性原则。由此可见,黑格尔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是将人直接看作一种感性直观的存在物,而是将“人的自我生成性的劳动”或“劳动的生成性”视为人的本质。这就是黑格尔思辨哲学所蕴含的“自我活动”的辩证法原则,也是他超越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性”原则之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对黑格尔表达了赞赏之情:“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2](P101)]

但是,黑格尔“自我活动”的辩证法原则也有着明显的缺陷:(1)黑格尔虽探讨了劳动同人的自我生

成的内在关系,但他并没有真正触及到现实的人与现实的劳动。一方面,黑格尔将劳动理解为自我意识的辩证法确实提升了人的主体性地位,但他同时又将人、人的本质等同于纯粹的自我意识,这样的人只能是抽象的人。另一方面,黑格尔以思辨思维方式表达的劳动不过是一种“抽象的精神的劳动”(也即纯粹的思维的活动),它只不过是意识的自我设定和对自己对象的克服,这样的劳动也只能是抽象劳动。因此,在这个问题上,黑格尔与国民经济学家是一致的——他们分享着一个共同的前提——抽象劳动;而且“二者都没有认识到感性的——自然的人的全部人性”,区别只在于一个是“唯心主义抽象”,一个是“唯物主义抽象”。^[6](P374-375)](2)黑格尔虽通过“对象性活动”达到了历史性原则,但这种历史性却是抽象的。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恩格斯明确指出,“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是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与其他哲学家不同的地方。^[7](P42)]这种“历史感”明显地表现在人是自己劳动的产物,人的产生和存在是一个历史过程,这无疑是黑格尔思维方式的优越之处。但黑格尔的“历史感”不会有真正的历史性,因为他只知道“抽象的精神的劳动”,这也就决定了劳动的否定性的辩证法所表达的也只能是思辨的历史,而不可能是人的现实的历史。所以,黑格尔所谓的“对异化对象的占有和扬弃”,只是自我意识在“自身内部的纯粹的、不停息的圆圈”^[2](P114)]式的运动,只具有“一个完全否定的和批判的外表”,而本质上是“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2](P99)]因为,它并不会触及到现实,也就更无力去改变现实。

马克思“对象性活动”理论的思维方式。费尔巴哈承认“感性对象性”,但人本主义思维方式决定了他缺失“自我活动”原则,由之导致的结果就是,“人的对象性本质”只是一种“对象性直观”(即“感性直观”),这样的人是现成的而非生成的、抽象的而非现实的。反之,黑格尔充分强调“自我活动”的辩证法原则,但在思辨思维方式的支配下,他将人设定为自我意识,作为自我意识的人只能进行“纯粹的自我活动”。在他这里,“人的对象性本质”倒不是一种“感性直观”,反而成了“纯粹的自我活动”所设定的一种“思想物”(即抽象的、非现实的“物性”)。这样一来,

黑格尔实际上扬弃了对象性本身,消除了对象世界。马克思则超越了他曾经景仰的这两位哲学前辈,因为他在对“对象性”原则和“自我活动”原则双重改造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理论——“对象性活动”理论:“当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此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2](P105)}

这里包含着双重思想:(1)人是感性的对象性存在物。“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2](P106)}存在物的存在就是对象性关系本身。对象性关系是一种原初关联,这种存在与对象是相互确证的,它的对象的存在就是它自身的真正存在。(2)人的对象性存在直接就是“对象性活动”。“对象性的存在物进行对象性活动,如果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进行对象性的活动。它所以只创造或设定对象,因为它被对象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因此,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2](P105)}这两层意思总结起来就是:一方面,现实的人的对象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和自我确证——现实的人的作品;另一方面,“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2](P58)}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2](P58)}

这样一来,“人与对象”的关系就不再是一种直接的肯定关系,而是一种以“对象性活动”为中介的辩证否定关系——人通过“对象性活动”将自己的体力、智力等人的本质力量加注到对象上,使对象依照人的意愿发生改变成为“人的作品”;接下来,“人的作品”又服务于人,满足人的需要,使人成为超脱一般动物的真正的人。总之,正是在这种“对象性活

动”中,现实的人才得以生成。马克思在《手稿》中正是通过“对象性活动”来论证人的现实存在的。整个世界分为自然、社会和人自身,“对象性活动”分别指向这三个向度并确证着人的三重属性和三重存在:人的自然属性——自然的存在、人的社会属性——社会的存在、人的意识属性——意识的存在。然而,作为一个现实存在的人,不可能是单纯的三者之一或它们的机械相加,必是包容各种属性与存在于自身之中的一个有机整体。将各种属性与存在勾连在一起成为“整体人”的本质,也是各种属性与存在赖以生成的内在根据。在马克思看来,这一本质与根据只能是作为“人的三重属性与存在辩证统一”的对象性活动。在对象性活动中,人如何生成了自己的对象,也就生成了怎样的自己。人的对象性活动,才是人的真实的存在,没有它,人就不成其为人。因此,在马克思那里,现实的人的本质乃是“对象性的活动”。

那么,马克思在《手稿》中创造性提出的“对象性活动”理论与他之后的理论又有何逻辑关联呢?在我们看来,“对象性活动”其实就是稍后《提纲》中的“实践活动”的一种最初表述;而“对象性活动”理论的思维方式,也就是《提纲》中体现的“实践思维方式”的一种萌芽形式。换句话说,《提纲》中表达与论证的“实践”原则,应视为《手稿》中的“对象性活动”原则逻辑发展的一种后承。《提纲》第一条“感性的人的活动”、“对象性的活动”就是“实践”原则最基本的哲学表达。由此,才能从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引出,人的本质就是实践,人的“自然性、社会性、意识性”这三种属性;人的“自然的存在”、“社会的存在”、“意识的存在”这三种存在,都是人的实践本质所派生并受其规定和制约的^①。

结 语

通过上述的论证,我们的结论是:(1)《手稿》中“对象性活动”理论的思维方式,即从“对象性活动”理解问题,无疑是蕴含着马克思新世界观“从现实的人的本质理解问题”(即“从实践理解问题”)的重要因素(前者是后者的萌芽形式,从“抽象的人的本质

① 关于这一问题的具体论述,参见倪志安、侯继迎:《实践思维方式与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关于人学的总体性方法论思考》,《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理解问题”转变为“从现实的人的本质——即从实践理解问题”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2)《手稿》中“对象性活动”理论的思维方式与总体上马克思所遵循的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思维方式是冲突的,但正是这种冲突或矛盾的存在,才使得《手稿》在马克思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变中,具有了从“抽象的人的本质理解问题”转变为从“现实的人的本质理解问题”(即从“人本主义思维方式理解问题”转变为从“实践思维方式理解问题”)这种承上启下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从而使马克思几个月后所发动的哲学革命,成为不仅是一种历史事实,而且是一种可以合马克思哲学思维方式转变的内在逻辑——进行合理的理解和阐释的。(3)《提纲》中通过对费尔巴哈的批判,马克思彻底抛弃了他在《手稿》中遵循的费尔巴哈式人本主义思维方式,创立了新唯物主义独特的实践思维方式。(4)《提纲》与《手稿》中的思维方式相比较,虽然具有“从人的本质理解问题”的这种一致性,但两种思维方式所立足的“人的本质”却有着“抽象”与“现实”的根本区别。按马克思新唯物主义

的理解,“现实的人的本质”就是“实践”,因此,马克思在《提纲》中创立的思维方式,也就是“从实践理解问题”的思维方式。

参考文献:

- [1] [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 [2]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 [3] [法]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M].第2卷.北京:三联书店,1965.
- [4] [日]今村仁司.阿尔都塞:认识论的断裂[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 [5]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M].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 [6] [德]卡尔·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M].北京:三联书店,2006.
-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A Key Link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rxism Philosophical Thinking Mode

——Based on Analysis of *The Manuscript of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in 1844*

Hou Jiying, Ni Zhian

(Research Center of Marxism Philosophy, Institute of Marxism Studies,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Key words] *The Manuscript of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in 1844*; humanistic thinking mode; object activity; practical thinking mode

[Abstract] The philosophical change realized by Marx's new materialism essentially denies the thinking mode of all previous philosophy in the way of practical thinking.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rx's philosophical thinking mode, *The Manuscript of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in 1844* is a special link of the preceding and the following. In the manuscript, the dominant way is Feuerbach's humanistic thinking mode. However, the proposition of "object activity" theory reflects Marx's sublation of Hegel's speculative thinking mode. It has become a key link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rx's philosophical thinking mode, 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eventual establishment of practical thinking mode. Because of the existence of this kind of conflict in manuscript, the logic of Marx's philosophical revolution and philosophical mode of thinking in the following months can be reasonably understood and interpreted.

[责任编辑 孔 伟]